

楚文化研究

【**中文题名**】楚辞成因论略—中国早期诗歌源流的探索(四)

【**作者**】高国兴

【**文献出处**】东疆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(1994年第2期)

【**分类号**】

【**关键词**】楚辞 诗歌源流

【**图片**】

【**内容**】

四、《诗经》在楚辞形成中的地位

北方中原文化与南方荆楚文化是两个文化系统，但并不是孤立的。文化交流是一种社会现象，是文化发展的必然和规律。北方中原文化在春秋战国之际曾发生一次南移，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六年》记载，王子朝“奉周之典籍以奔楚”，《论语·微子篇》中提到当时礼崩乐坏的情况下，“太师挚适齐，亚饭干适楚”，加强了中原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。因此，中原文学为荆楚文学发展提供了背景，春秋以来，楚人多次引用《诗经》，如《左传·文公十年》载楚人引《熏民》、《民劳》，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载楚人引《六月》《时迈》，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载楚人引《文王》。荆楚文学较中原文学相比，虽然起步较晚，但有可能一开始就以《诗经》为起点，越过初期的发展阶段发展。

荆楚文学对中原文学(《诗经》)不是照搬照抄，而是在改造的基础上创新。

从古经史中钩沉，有下列楚歌值得我们注意：宁戚《饭牛》(《淮南子》)孔子《去鲁》亡《史记》)、《获麟歌》(《孔丛子》)、《龟山操》、楚狂《凤兮歌》(《庄子》)及(《论语》)、吴人《渔父》(《吴越春秋》)以及《徐人歌》(《新序冲、《越人歌》(《说苑神，还有《南蒯乡人歌》(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)、《齐莱人歌》(《左传·哀公五年》)、《吴申叔仪歌》(《左传·哀公十三年》)、《楚孺子歌》(《孟子·离娄》)、《南风歌》(《孔子家语》)、《暇豫歌》(《国语·晋语》)等等。这是楚国的民歌形态，同《诗经》中的江汉一些民歌相同，它们具备如下一些特点：语气上，文言虚词运用于诗，增加了诗句的口语感、散文化，没有《诗经》诗歌那种规范的竹板节奏，同时，方言的运用如“兮”，使诗具有地方色彩，句式上，有的诗以三音步为基本结构形式，如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。”等；形式上，篇幅一般短小。民间诗歌的产生和发展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盲目性，是不规则的，因此，这些民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荆楚文化特征，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楚辞。荆楚民歌只能成为母本，与外来文学(中原文学)以及老庄散文的父本，杂交创造一种新形式(楚辞正是这样产生的)。

《桔颂》(不论它是屈原的早期作品还是晚期作品)、《天问》(不论其内容是否与形式有关系)是四言诗，显然是屈原照搬中原诗歌样式，楚辞中既有民间九歌(或巫化九歌)样式，又有四言诗样式，说明屈原熟谙这些体裁。然而，楚辞中并没有更多的四言诗，又说明荆楚文学对中原文学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。《桔颂》的以物喻人、借景抒情是楚辞中仅有的，所以它采用四言诗的形式，也继承了中原诗歌“抒情言志”的写法，这是对中原诗歌优秀成就的发扬。《桔颂》在楚辞中并不因它的四言形式而降低了它的价值，相反，它的内容和形式的合理统一使诗赢得了千百年来人们的喜爱，取得了高于《雅》、《颂》的巨大成就。《天问》“是屈原把自己对于自然和历史的批判，采取问难的方式提出”，显然用《离骚》的形式或《九歌》的形式，都不能很好地表达他对“客观世界的问难。”而诗的口语化(问体)、语气词的运用，显示出诗更多地吸取了散文的特点与《诗经》中的四言诗有着本质的不同。如“帝降夷界，革孽夏民。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嫫?冯珞利决，封砮是射，何献燕肉之膏而后帝不若?捉娶纯狐，眩妻爱谋；何男之射革而交春摆之？”反映了屈原对中原诗歌改造创新的轨迹。